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新进展

谢天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沙坪坝 401331)

摘要: 制度变迁理论历来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议题, 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动态变化, 制度变迁理论也经历了理论创新, 这些创新增强了有关于制度的理解。学界对此进行了丰富研究, 本文系统回顾了近年来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文献, 发现以下几方面新进展: 第一, 对制度变迁动因的探究; 第二, 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第三, 制度变迁复杂性的多层次分析; 第四, 话语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最后, 展望了制度变迁理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 动态博弈分析; 话语制度主义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32

一、引言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深入理解制度变迁对于揭示经济发展的动因和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以下简称 AJR)三位学者, 以表彰他们关于“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贡献, 再次将全球学术界的目光聚焦于制度经济学(杨子砚、周颖刚, 2024)。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相互交织、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 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展现出深刻的理论价值, 也表现出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 从而激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丰富的研究成果(田湘波, 2023)。

在过去几十年中, 制度变迁理论已经从简单的静态分析发展到更为复杂的动态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更多地关注制度的结构和功能, 而近期的研究则更加重视制度变迁本身, 以及这些变迁对经济表现和发展策略的影响。本文对近年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系统回顾, 希望能够更好地跟踪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奠定知识厚度, 并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二、制度变迁动因探究

学界目前对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关注点主要在内生变迁。制度变迁并非偶然现象, 其发展方向也非随机, 而是具有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源泉(高帆, 2024; 曲铁华, 2024), 并且相对来说, 内生动力比外在因素更能直接影响制度变迁(崔宁波等, 2021)。虽然以上学者指出了内生动力的重要性, 但要更全面理解制度变迁的动因, 还需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可作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的动力(祁占勇, 2022), 黄丽静和朱敬(2024)进一步强调, 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不仅是制度的自我学习, 还是利益主体的互动竞争。这一观点为探究制度变迁的动因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 个体认知、学习过程和学习效应等学习因素已被新制度经济学纳入制度变迁的研究框架。认知是制度变迁内生动力的核心(丰雷等, 2019), 变迁主体具有动态特征的学习过程则能产生新的制度构思, 成为制度变迁的解释基础(黄凯南、乔元波, 2018; Wang et al., 2022)。学习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认可, 但具体机制要进一步明确。张云翔(2022)研究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内生性政策学习识别和转化外生性因素, 进而推动制度变迁。学习理论不仅能够刻画制度变迁的细节, 还能通过辅助进化理论解释制度的内生性特征, 并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影响制度变迁: 学习类型的相关概念有助于阐释制度的内生性; 引入学习行为的制度研究有助于分析不同层次间的互动; 行为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特征能够具体化(孙丹、丰雷, 2024)。一个全面且细致的包含

作者简介: 谢天(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制度变迁。

通讯作者: 谢天

学习行为的制度分析框架,不仅能够整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路径,而且能够促进微观行为与宏观制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Bell (2017) 通过融合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引入新的代理维度到历史制度主义,以期将制度稳定与变迁纳入统一框架,有效回应现实事件。在理论构建中必须将制度稳定与变迁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进行动态分析,超越传统上对制度稳定或变迁单一维度的探讨(李凤云, 2023)。制度逻辑的理论构建对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至关重要,从而使制度理论能够更科学地指导实践发展(石明明、张小军, 2023),并避免因研究框架的片面性而导致的不利影响(马正立、赵玉胜, 2022)。在制度变迁动因探究上,尽管各流派均能从自身视角解释制度变迁,但受限于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解释往往缺乏完整性和有效性,因此,学界开始寻求对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观点的综合,以期获得对制度变迁及其动因的全面理解。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交流与融合已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实践(马雪松, 2022)。

三、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AJR 三位学者荣获 202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利用殖民地发展的历史自然实验,对制度如何影响繁荣做了实证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研究共同深化了对制度作用的解释。但是为什么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主动改变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有益的制度变迁为何不能实现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Acemoglu et al. (2001) 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分析框架,用于对制度变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该框架融合了制度变迁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理论,揭示了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集团在社会冲突面前的动态博弈结果就是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承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而解释了为何政治科斯定理在制度变迁中并不适用(阿西莫格鲁, 2016)。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对国家兴衰以及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Acemoglu et al., 2005; Acemoglu & Robinson, 2008)。通过将社会冲突与制度、社会力量相结合,他们为制度改革的策略和时机选择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Acemoglu et al., 2001)。

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将制度变迁视为理性参与者战略选择的结果,并整合到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模型中。这一分析框架不仅为理解制度变迁、经济政策以及内生制度理论提供了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而且对于揭示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意义。Powell (2024) 在 AJR 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了无限期动态重复博弈中的承诺问题。Acemoglu 和 Robinson (2023) 最近的一个研究是扩展基础模型,以便探讨政府执行规则有效性和国家能力建设的问题。吴军 (2021) 构建了多元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乡村经济社会治理制度变迁过程。

但是 AJR 的研究也有一定局限。他们的研究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再到经济结果,存在一个单向的层级结构,这一假设在简化复杂的现实情况以进行理论建模时是必要的。然而,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演化的,不同的制度之间可能存在耦合结构(卓晔, 2023)。另一方面,他们将文化视为外生变量,削弱了他们理论的解释力度,文化是影响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Joanna & Rafal, 2021)。此外,对他们的制度变迁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仍然存在许多困难(李宝良等, 2024; Diallo, 2022),所以,目前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仍然缺乏坚实的实证证据支持。

四、制度变迁复杂性的多层次分析

学界开始认识到制度变迁并非仅限于单一层面的现象,近期的研究更加关注制度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依存性。相互依存或互补的制度与特定制度能进行内生互动和演化(黄建洪、陈伟光, 2024; 盛广耀, 2017),既定的制度安排产生于特定的宏观环境,宏观环境与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影响制度变迁(沈国兵、沈彬朝, 2024; 汪彬, 2023)。在探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演进时,中央、地方、基层政府、干部及农民等多方行动者在持续的互动中共同推进了协商制度的发展,并实现了有效的治理成果(王永香、李忠鹏, 2024)。组织场域同样受到关注,在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犯罪治理需要多组织机制的协同作用,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和社会组织应该适应制度转型,克服路径依赖,并通过再制度化实现组织优化(戴洁, 2024)。丰雷等 (2019)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强调了中央与地方间的互动对制度演化的推动作用。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制度的生成与变迁往往会受现有制度的约束,且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和协同作用对制度发展必定具有影响(严东、唐鸣, 2024)。制度学者正逐渐将制度视为一个复合体系,而非单一实体,并基于此观点发展出新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旨在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邹旭等 (2024) 的研究发现,在工业用地配置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之间进行了充分的互动。这些行动者分别以制度供给者、

制度创新者和制度需求者的身份,在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探索、调整和深化改革阶段,主导了制度演变的方向。李笑宇和任宗哲(2024)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从变迁历程、变迁逻辑到制度效能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为解读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化、理顺新时代中国财政体系提供了思路和启示。有学者认为单个制度要素并不构成高成长型创业的必要条件,政府、市场与社会构建有效的制度组态,实现多元制度的互补和协同,能够激发高成长型创业(郑馨等,2024)。如果将制度视为多种要素构成的复合体,那么有关制度变迁的观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制度学者正尝试通过整合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变量,以更有效地阐释制度变迁的动因。朱庆环和杜文平(2024)指出,学区制度变迁在宏观层面受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变革的影响;在中观层面,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教育管理体制对其产生制约;而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政府、学校和社会集体行动的结果。

五、话语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

话语制度主义由美国学者 Vivien Schmidt 最早提出, Schmidt (2010) 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中关于制度变迁内生性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整合与拓展,融入政治学视角,将意识与制度间的话语互动过程定义为话语制度主义。

岳圣淞(2024)借鉴话语制度主义理论,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变迁为案例,提供了国际制度话语格局演变的连贯解释逻辑。话语制度主义与政策分析具有关联,话语通过政策过程将理念转化为行动,进而推动制度变迁(吕佩安,2017; King, 2024)。在话语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制度变迁重视话语的沟通维度,其中有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话语的交互性,即准确表达、传递并合法化信息的过程;其次是话语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中行动者角色的重视,尤其是那些具有思想并能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行动者(沈燕培,2017;王帅杰,2024)。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新兴流派,话语制度主义强调行为者间的交流、对话、辩论和协商等互动行为对制度及政策变迁与执行过程的影响。

从话语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并非其他理论流派所假设的那般稳定不变,而是更接近于可变的政策。陈静(2024)在其研究中分析了美国智库如何通过话语或观念与美国决策者进行“协作性对话”、与美国公众进行“沟通性对话”,以期影响和形塑美国决策者对华科技政策和公众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对华科技政策的演变,并牵动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刘胜湘和唐探奇(2024)指出秩序愿景差异通过制度反馈促成了秉持不同制度变迁方案的国家集团形成,通过大国博弈影响秩序愿景的协调方式,进而影响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变迁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岳圣淞,2023)。观念的效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依赖于具体的情境,并通过特定的语言得以表达,因此,一种独特而有益的话语分析能够克服传统观念分析的固有缺陷,从更为动态的视角探讨制度变迁的相关议题。Rambaree(2021)从国际制度的演化规律出发,将行为体间的话语互动视为解释制度变迁的核心变量,并尝试为制度竞争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提供连贯性的解释。

六、结语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制度变迁理论的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进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制度变迁动因的探究;第二,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第三,制度变迁复杂性的多层次分析;第四,话语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学者们的研究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制度变迁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结论。尽管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有三个问题形成了学界的基本共识。一是在假设前提上,大多数学者认同在研究制度时应采用行为者非完全理性的假设,强调人类行为和意识的主观性及局限性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崔兵,2022;黄凯南,2021)。二是在研究视角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宏观研究聚焦于宏观环境变化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而微观研究则着重分析行为者在制度变迁中的具体影响(Hudik, 2021)。三是在路径研究上,学界正逐步摒弃断裂式变化的思维模式,转而认为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内生性的、逐步演化的过程(孙晓华等,2024;张道根,2022;Koreh, 2019)。上述这些前沿探索为进一步构建更一般化、更全面的制度变迁理论奠定了基础,相信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在此领域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本文的分析强调了继续深化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数字化、人工智能与制度变迁。Acemoglu 的最新研究也聚焦于人工智能,评估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Acemoglu, 2024)。技术进步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已经显著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和管理制度,促进了新的制度形式和管理实践的出现。然而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配套基础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的完善,制度变迁理论与

数字经济结合有利于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通过发挥制度优势,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子砚,周颖刚.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深度评析[J].管理评论,2024,36(10):3-8.
- [2] 田湘波.制度同构理论研究评述: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的视角[J].决策与信息,2023,(07):47-61.
- [3] 高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逻辑与实践特征[J].上海经济研究,2024,(02):17-29.
- [4] 曲铁华.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制度变迁:内在动力、总体特征及历史经验[J].社会科学战线,2024,(01):219-230.
- [5] 崔宁波,范月圆,巴雪真.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逻辑与展望——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J].中州学刊,2021,(10):33-40.
- [6] 祁占勇,闫丽媛,王鹏伟.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制度主义取向及其行动路径[J].基础教育,2022,19(06):46-56.
- [7] 黄丽静,朱敬.我国普通高中建设制度变迁脉络、逻辑与路向[J].教学与管理,2024,(10):7-12.
- [8] 丰雷,江丽,郑文博.认知、非正式约束与制度变迁:基于演化博弈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02):165-177.
- [9] 黄凯南,乔元波.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分析——基于多主体的学习过程[J].经济研究,2018,53(12):161-176.
- [10] WANG H, CHEN B, KOPPENJAN J. A refined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approach to incremental policy change: The case of process-tracing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PPP policies between 1988 and 2017 [J].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2022,7(1):27-51.
- [11] 张云翔.地方数字经济监管中的多层级政策学习与监管模式变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04):101-111.
- [12] 孙丹,丰雷.动态制度变迁中的学习行为——理论发展回顾与探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01):182-193.
- [13] BELL 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dimensions of agency: Bankers, institutions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J].Political studies,2017,65(3):724-739.
- [14] 李凤云.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制度可塑性悖论初探[J].比较政治学研究,2023,(02):120-139.
- [15] 石明明,张小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23,(09):4-23+204.
- [16] 马正立,赵玉胜.制度逻辑理论建构:基本原则与整体模型[J].重庆社会科学,2022,(05):114-128.
- [17] 马雪松.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2,(06):187-197.
- [18]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5):1369-1401.
- [19] 达龙·阿西莫格鲁.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不成立:社会冲突、承诺以及政治学[A].比较(吴敬琏主编).第 84 辑[C].中信出版社,2016.
- [20]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Institu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A].in Aghion, P. and S. Durlauf (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C],Vol.1A,Amsterdam,NL:Elsevier,North-Holland, 2005.
- [21]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1):267-293.
- [22] POWELL R. Power sharing with weak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2024,36(2):186-211.
- [23]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Weak, despotic, or inclusive? How state type emerges from state versus civil society competition[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23,117(2):407-420.
- [24] 吴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乡村治理结构优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21.
- [25] 卓晔.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04):126-155+160.
- [26] JOANNA K D, RAFAL M. Institutions without Culture: On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s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21,55(3):656-676.
- [27] 李宝良,郭其友,郑文智.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202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4,46(11):138-152.
- [28] DIALLO B.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 to testing institutional hypotheses: the case of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J].Empirical Economics,2022,62(5):2587-2600.
- [29] 黄建洪,陈伟光.“圈层式创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微观机理研究——基于苏州片区创新实践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4,(10):60-68+93.

- [30] 盛广耀.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与户籍制度改革分析[J].经济学家,2017,(04):59-66.
- [31] 沈国兵,沈彬朝.高标准贸易协定与全球供应链韧性:制度环境视角[J].经济研究,2024,59(05):151-169.
- [32] 汪彬.多层次交互式制度创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新理路[J].中国行政管理,2023,39(08):89-99.
- [33] 王永香,李忠鹏.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J].求实,2024,(02):18-31+109.
- [34] 戴洁.制度转型、组织行为与犯罪的多元治理——一种新的犯罪解释论及治理框架[J].法学,2024,(02):85-101.
- [35] 丰雷,郑文博,张明辉.中国农地制度变迁 70 年:中央—地方一个体的互动与共演[J].管理世界,2019,35(09):30-48.
- [36] 严东,唐鸣.制度互动:理解制度变迁的一个视角——以匈奴为案例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J].江汉论坛,2024,(06):57-64.
- [37] 邹旭,马贤磊,石晓平.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制度变迁逻辑——基于“主体互动-制度共演”框架的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24,17(02):176-195+200.
- [38] 李笑宇,任宗哲.历程、逻辑与效能: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4,13(05):82-95.
- [39] 郑馨,鲍舒琴,安雯雯.穿越衰退与繁荣:复杂制度组态如何激发高成长型创业[J/OL].南开管理评论,1-38.
- [40] 朱庆环,杜文平.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学区制演进的历史脉络与制度逻辑[J].教育科学研究,2024,(06):36-42.
- [41] SCHMIDT V A.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2(1):1-25.
- [42] 岳圣淞.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J].东北亚论坛,2024,33(02):98-113+128.
- [43] 吕佩安.话语何以重要?——话语性制度主义之政策分析[J].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17,13(02):37-61.
- [44] KING C J. Explaining Housing Policy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J].Social Sciences,2024,13(9):468-468.
- [45] 沈燕培.理念、话语与制度变迁——话语性制度主义介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03):323-329.
- [46] 王帅杰.比较教育中的话语制度主义:一种连接全球与地方的理论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2024,51(11):46-63.
- [47] 陈静.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中的智库角色——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J].情报杂志,2024,43(11):61-67.
- [48] 刘胜湘,唐探奇.秩序愿景再均衡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09):96-129+162-163.
- [49] 岳圣淞.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J].当代亚太,2023,(04):131-165+168.
- [50] RAMBAREE B B. Discourse and power in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Cogent Social Sciences,2021,7(1):1852673.
- [51] 崔兵.不确定性与制度的认知本质——基于扩展的海勒模型[J].社会科学家,2022,(01):115-121.
- [52] 黄凯南.制度理性建构论与制度自发演进论的比较及其融合[J].文史哲,2021,(05):142-153+168.
- [53] HUDIK M. Push factors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21,189:504-514.
- [54] 孙晓华,唐卓伟,马雪娇,等.知识产权制度渐进式改革之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演进[J].经济研究,2024,59(09):136-153.
- [55] 张道根.经济制度变迁逻辑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J].学术月刊,2022,54(01):58-67.
- [56] KOREH M, MANDELKERN R, SHPAIZMAN I. A dynam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s[J].Public administration,2019,97(3):605-620.
- [57] ACEMOGLU D.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24.

New Development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Xie Tia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has long been a key scholarly concern. As economies, politics and societies evolve, the theory itself has been repeatedly reinvented,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nstitutions are and how they work.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rapidly expanding literature of the past decade and identifies four major advances: Firstly, new explanations of the driver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econdly, dynamic-game analyses of the change process; Thirdly, multi-level approaches to its complexity; Fourthly, the perspective of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aper concludes by mapping out promising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providing a reference point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ynamic Game Analysis;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